

最近，看到一些材料，其中有的说法，值得研究。由此引出的话，有的是老话，有的是新想起来的，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联系。

重中学科性质

所以说是“重申”，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说过。

张静如 著

張靜如文集

第一卷

说法，在今天研究中共历史的圈子内仍然存在。本来谁爱怎样认识自由，别人不能也不必强迫。问题是这些说法不科学，所以还必受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比如，说是“政治性非常强的历史学科”，就把学科性质和学科

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，一般说来这种根本属性只有一

张静如 著

張靜如文集

中石題

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静如文集/张静如著. —深圳:海天出版社, 2006
ISBN 7-80697-851-8

I.张... II.张... III.①张静如—文集②中国共产党—党史—研究—文集 IV.D2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3794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:旷听 张小娟
责任技编:钟愉琼 装帧设计:海天龙

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:83461000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开本:940mm×1270mm 1/32 印张:44.125
字数:1380千字
定价:160.00元(共四册)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作者 1933年1月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



2005年12月



2005年12月

与日本学者斋藤道彦
一起在李大钊故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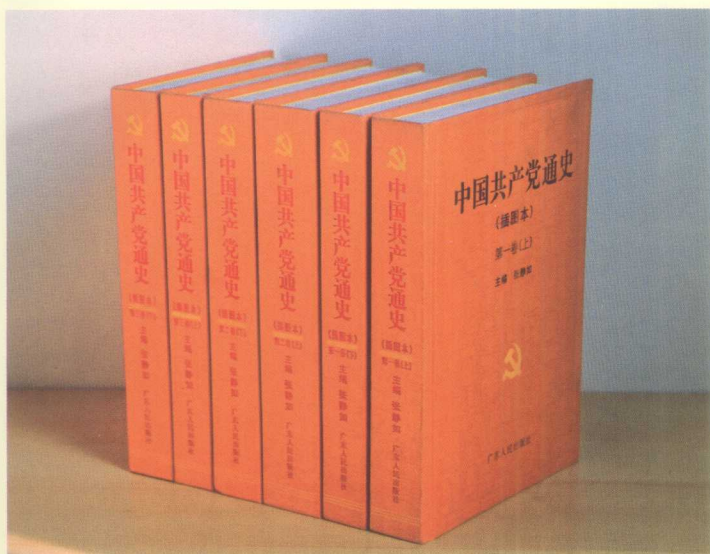


2003年12月

张静如著《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》出版座谈会



1995年10月



主编《中国共产党通史》



2003年2月11日下午生日会



2003年2月11日上午座谈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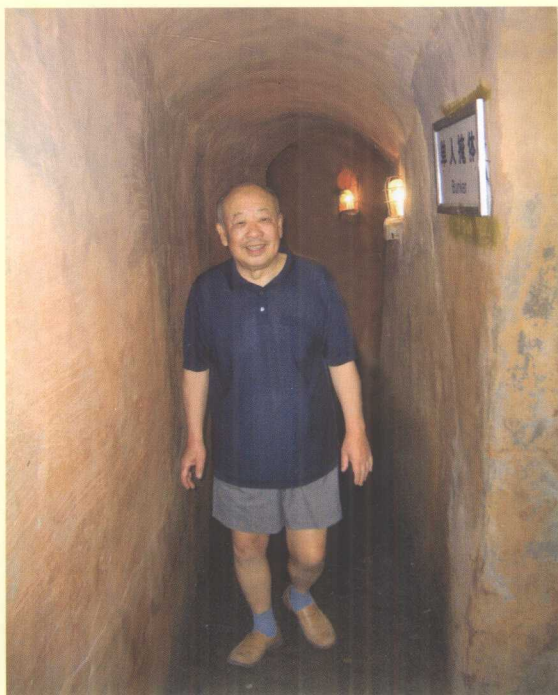


1999年和老伴关崇峻一起在都江堰主持研究生会期间



作者和学生在一起

2005 年参观顺义焦
庄户地道战遗址



2004 年在颐和园



作者和家人在一起

自序

小时候，我爱看历史小人书，稍大，认识些字，就看历史小说。到初中三年级，发现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廿四史，陆续借出，翻看了一遍。虽说因为古文底子差并未真正看懂，但多少还是增添了一些知识，也加强了读史的兴趣。说实话，我并不是用功的学生，整天想打球玩，经常不上课，由同学替答“到”或借体育课的机会擦旷课，考试也请同学代写答卷。上了高中之后，我的一个小学同学问我，你不好好学习，将来怎么办？这一问，引起我的深思。由于同学的规劝，我开始用起功来。大概是有点小聪明，成绩很快就居于班上前三名之列。北京解放后，我读了一些政治书籍，思想进步了，也入了团。同时，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借了些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、郭沫若、吕振羽、翦伯赞、侯外庐的著作。读后，既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知识，也增加了许多历史知识。1950年，我中学毕业，由于特别崇拜历史学家陈垣，决定考辅仁大学历史系。那时，每个考生要填五个志愿，我都写了辅仁大学历史系。我想，人若有志，不能姓“碰”，决心当陈老的学生。果然，如愿以偿，听上了陈老的课。特别是进入比中学图书馆大得多的大学图书馆，使我着了迷，只要是史书，什么都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很快

发现两条对我以后的进步有很大作用的治学之道：一个是自学为主，不能只听课、记笔记、背笔记；一个是在自学的基础上，发现问题，研究问题，而这就要尽快定研究方向，进入角色。所以，在入大学后，我常常不上课，或去图书馆，或去旧书店，也不重视考试，不及格再补考。总之，一切以自己看书并研究问题为主。入学以后，我在博览的同时，专攻甲骨文。可是，一年之后发现了问题，因为条件不具备，搞不进去。由此，我又悟出一个道理，定方向必须从主客观实际条件出发。于是，我分析了一下自己的主观条件：一是外语差，又没兴趣下工夫，故而不能搞世界史；一是古文底子弱，也不能弄古代史。适逢二年级开中国近代史，教课老师是荣孟源。由于得到他的帮助，我又转向近代史，主攻太平天国。当时，我经常去近代史所，借书还书，请教问题。小桌上堆的都是这方面的书，被同学戏称太平天国“专家”。1952年秋季开学后，由于辅仁大学与师范大学合起来，我就自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。当时，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，工作很努力，所以党支部决定发展我入党。但是，在发展会上，党员们误认为我学习不努力（政治经济学课考试不及格），没有通过。党支部书记、我的介绍人批评我，要求我补考及格。我说这容易，保证考好。结果，我考了100分。到1953年7月，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正当我以浓厚的兴趣研究太平天国方面的问题的时候，1953年4月，组织上调我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当资料员。这就是说，我必须放弃原有方向，改搞中国革命史。既然需要，当然应该服从，而且我也非常愿意当资料员，因为可以接触大量史料，而不掌握史料就不能研究历史。这一点，是我在历史系学习过程中牢固形成的观念。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的资料室藏书甚丰，几乎把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所存的民国时代出版的期刊、报纸及书籍都集中在一起。整整十个月的时候，我常住在资料室，从早到晚和这些资

料泡在一起，像《新青年》、《少年中国》等期刊，都通看过一遍。同时，我管采购，常跑旧书店，同书商打交道，那些人对书目很熟，也使我增长了很多知识。这样，我所掌握的资料量是相当可观的。当时，我的同事们在备课中，都到资料室问我该看什么材料。这段时间的实践使我有两个方面的体验：一是想掌握史料只有下苦功夫；一是想掌握史料还要下巧功夫。总之，资料员这一工作岗位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，可以说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转过年来，组织上要我去北京大学哲学系跟苏联专家学哲学。说实在的，我有点不愿意去，可一想自己是共产党员，不服从调动不应该。既然去，就要学点本事，一可读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二可利用北大图书馆收集资料。至于苏联专家的课，我真不爱听。外国人说话太啰唆，一上午几堂课没几句有用的话。又不能不去听，只好利用上课思考问题或休息脑子。两年半的时间，我认真读了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、《反杜林论》、《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》等著作；在图书馆翻阅了几百种期刊，并在此基础上写了毕业论文《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》。这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的小册子，在今天看来，水平是不高的。不过，在当时却有开创性，对后来李大钊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。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，我接触了冯友兰、金岳霖、张岱年、任继愈、石峻等很多老师，从他们那里获益不少。去学习时叫进修，到上个世纪80年代又说是研究生班，发了证书。于是，我就混上了研究生学历。离开北大之前，冯友兰找我谈话，想让我留下，我没同意。幸亏如此，不然很可能成了右派，因为我对苏联专家很看不起，常背地说他是废物。

1956年7月，我回师大政教系工作，在教了一年哲学课之后又回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。1959年五四运动40周年的时候，我与其他教师合作写了《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》，于1960年由上海

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，在1979年又修改再版。现在看来，书中有不少毛病和问题，有的论断是不对的，但在当时所起的填补空白的作用仍应肯定。这之后，进行研究的客观条件就越来越差了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，虽然也发表过些文章，但像样的成果就出不来了。当然，我并没放弃学术研究，只是在不被别人知道的情况下积累资料，研究问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我就被“打倒”，入了劳改队。我是“学生领袖”谭厚兰所在班的辅导员，她要我投靠关锋、戚本禹，我没理她，当然要被“揪”出来。“解放”以后，当“逍遥派”，烧锅炉，下放农村。这种情况下，当然没有办法再研究我熟悉的问题，只能碰到什么研究什么。烧锅炉时，研究烟道灰能不能把温度烧上去，结果居然成功了。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，论证烧烟道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。可惜，文章早已丢失。到农村劳动，就研究针灸，居然把半身不遂的老太太动不了的手治好了。这一切，使自己很有成就感。但是，在此期间，我总想做点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事，遂托朋友跟中国革命博物馆去说。没想到他们把我的简历上报到中办，说王洪文要个学习秘书，幸好此事未成，否则就倒了霉。事后我知道了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到1973年，校军宣队让我参加编党史教材。当然，那时候都是写些违背历史事实的东西，但这一段工作对重新熟悉史料也还是有一定作用的。1976年10月“四人帮”被打倒后，我在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发表了《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》。这是从1966年6月以来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，但尚未使用个人名义。1978年，朋友们劝我写东西，特别是希望由我出面呼吁为李大钊平反。所以，2月16日，我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署名文章《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》，从此开始了正常的学术活动。这之后到现在，我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：

第一，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，出版了二十几种专著、教材、丛书、工具书。

第二，培养了一批硕士生、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，至今已有百名以上。已毕业的有在高校的，也有在科研、出版或党政部门的。他们或在学术上或在其他方面，都已做出很多贡献。同时，不少青年研究工作者与我有密切联系，成为我的编外弟子。

第三，参加了多次学术讨论会，做过百次以上学术报告。另外，先后在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市委党校、西安政治学院等几十所高校、党校、军校任兼职教授。

第四，多次参加教育部政教司、社科司、社政司召开的有关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会议，并主持中共党史、中国革命史大纲及毛泽东思想概论教材的编写工作。

第五，参加了多项学术评审工作，如北京市高校和党校职称评审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点评审等。

第六，参加了几个学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，如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、中国中共党史学会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等。

二十年来，可以说，我对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综观我的学术活动特点是：有开创性，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观点；思想解放，比较实事求是；写文章、讲话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。具体说来，在有关中共历史研究方面，我提出的新的并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主张有四点：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；二是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；三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历史；四是倡导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。在我的研究中，毛病是在每个新开创的研究领域中没有深入下去。

1994年和2001年，我把自己的文章选出一部分，以《张静如自选集》、《静如文存》为书名，分别由大连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。在此基

基础上，又增添了后来的文章，形成本文集。这次选入本文集的文章，共199篇，时限在2005年12月之前。所选文章的内容，除文字方面的差错做了更正外，没有改动（包括引文注释的版本），以保持原样。每篇文章之后，写一段话，谓之“评文纪事”，对过去的文章做些评论和背景介绍，并顺便记上一些学术上的活动，便于后人研究。对于1999年10月《静如文存》中写的“评文纪事”的内容，有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或补充。总的来看，我认为自己的文章，有的写得较好，有的很一般；文章中的观点，有对的，也有不恰当的。所以，对自认为可以的、对的，做了肯定；对自认为差的、不恰当的，做了点自我批评。

欧阳中石是我舅丈著名京剧艺术家奚啸伯的大弟子，家里同辈人都称他为大师兄，所以请他帮我题了书名，当然应该谢谢他。同时，在整理本文集的过程中，我的学生王冠中、马长虹、李向勇、李海鹏、纪雪艳帮了很大的忙，谨记于此。

文集的出版，得到海天出版社的大力支持，特致谢意。

2006年1月